警务数据交易： 主体资格审视与路径探索

■ 毛立琦

摘要 以往公安机关在数据交易中的定位往往以“监管方”身份呈现，但随着数据经济的发展，公共数据资源的合理应用成为风向标，公安机关能否成为数据交易的供给方值得探讨。从数据要素价值本身出发，警务数据在进行规范处理后的流转和利用，能够打破数据尘封历史，释放更多信息价值，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不过在这种新型的数据运营模式下，必须合理审视警务数据的交易风险与障碍，厘清交易、保护、监管界限，重塑警务数据再利用语境，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关键词 数据交易 警务数据 公共数据 数据供给方 利益衡量

在信息化社会中，数据已经演变为一种创新型的生产要素，兼具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具有双重用途的重要商品。^[1]在数据交易的过程中，数据实现了从基础资源要素到核心数据资产的转变，而同样具备“生产要素”属性的公共数据，也可以作为商品用于生产经营与价值创造。^[2]公共数据作为数据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采集和产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交通、医疗、教育、安全等。警务数据是

公安机关在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资源，关涉敏感的个人信息及重要的公共安全信息，其不仅具有公共数据的一般属性，还因敏感性和重要性使得其在数据交易市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入场：错综复杂的数据交易关系

数据交易通常涉及四类主体，分别是数

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金融数据治理的公私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YJC820026）研究成果。

据供给方、数据需求方、数据交易服务机构（例如数据交易平台）和监管方。在数据交易的语境中，公安机关通常被视为监管方，这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定位。

数据交易涉及多方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难以进行直观评估和监管。因此，合规性成为数据交易各流程中需要严格遵守的原则。为了强化监管力度，《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中都明确了网络安全及信息保护的多头监管制度。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网信部门为主导，电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协同监管的治理体系。公安机关依据其职责、能力和制度安排，主要在以下方面承担监管责任：一是针对数据交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数据盗窃、非法获取及滥用个人信息等，依法开展侦查工作，深入查明犯罪事实，并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二是加强对数据交易平台的日常监管与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数据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数据交易模式的发展，公安机关不再仅仅作为监管方存在，而承担着愈发多样的身份。进入大数据时代，公安机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力防范，而是逐渐转向以“人防、物防、技防”为核心的全方位防御体系。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在公安执法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作为数据需求方的地位日益凸显，经常为了满足执法需求，而购买数据或与数据相关的服务。然而，囿于警务数据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公安机关作为数据供给方的角色定位还在摸索之中。

目前，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互联网爬虫数据是数据交易机构的主要数据来源。2015 年我国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该纲要明确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揭示传统技术手段难以捕捉的深层次关联关系，进而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的融合与资源整合。^[3]2020 年之前，政府所公开的数据主要是政府向全社会无差别披露的数据，政府有条件开放的数据资源受相关法规制度约束难以真正向社会流通，数据价值未能得到完全释放。在公共数据扩大开放与运营的政策支持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等交易机构开始发挥其作用，让更多高价值的公共数据得以流入市场。

同时，随着隐私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公共数据在政府公信力的背书和公共服务价值导向的推动下，逐渐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数据的流通效率，也进一步推动了数据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掌握着庞大的公共数据资源，通过开放这些数据，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数据的挖掘分析，可以实现个人、企业以及政府三方在数据应用中的互利共赢。^[4]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公安机关作为政府部门，也同样可以看作为数据交易市场中的供给方，成为数据交易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二、审核：警务数据可否成为数据交易客体

公安机关采集与存储的数据，大多聚焦于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领域，因其与一般公共数据在概念及范围的差异性，而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警务数据涉及多个层面，不仅涵盖了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处置数据、预警防范数据，还囊括了基础数据和其他与公共安全维护密切相关的数据。^[5]警务数据可否作为市场数据交易的客体，这一问题的核

心在于探讨公安机关是否有权尝试一种新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这将关涉数据权益、隐私保护、公共安全的平衡边界。

（一）公共数据新应用的风向标

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公共数据交易则是其中最市场化的开发利用模式。为进一步深化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国家及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数据安全法》第五章阐述了政务数据开放的原则规定，为数据的交易使用奠定合法性基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以促进数据要素更好发挥作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数据新规》），其中明确提出：“鼓励公共数据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以模型、核验等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对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推动按用途加大供给使用范围。”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区制定了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地方性规范，基于对各地规范的梳理分析，政府对公共数据交易呈现出“促进公共数据流通、保障公共数据安全、建立规范合同机制、强化监管与执法”的政策导向。简言之，推动公共数据的分类分级、有序交易是大势所趋。

基于对目前已经上市交易的公共数据产品分析，根据数据属性和应用场景的不同，目前可交易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以下三类：一是社会经济数据，用于分析国家经济状况和趋势；二是行政管理数据，用于监督社会经济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三是公共服务数据，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便更加科学地决策。警务数据的流转和利

用，亦可实现与其他领域数据的有机融合，释放更多信息价值，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使公众从数据中受益。

（二）数据开放主体的利益衡量

数据交易牵涉多方主体利益，目前仍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在数据交易中，传统财产权框架的直接应用面临一定局限性，其理论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因此，围绕财产权类型的拓展与创新，理论界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种路径是延伸或改造传统财产权，设立数据供给方的所有权与数据处理者的用益权二元结构，旨在平衡数据财产权益的分配。^[6]；另一种则是打破传统框架，在物权模式基础上予以变通或改造，创造符合数据特征的新型财产权，更好地促进数据的权能分离和交易流通。^[7]两种讨论各有优劣，未有定论。《数据新规》选择淡化数据归属关系，以促进数据流通与价值实现为依归，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特色数据产权制度框架。

尽管当前关于数据权益的归属主体、公共数据的交易范围等议题，尚未在法律层面上获得明确界定，但国有私产理论给公共数据的商业化运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它打破了部分学者对公共数据仅属于公共财产、仅关涉公共利益的固有观念，指出公共数据同样可以作为国有私产，实现其盈利价值。不仅如此，国有私产属性的公共数据在范畴上更为广泛，其涵盖的范围远超过单纯作为“公共用物”的政府数据，这一理论为公共数据的多元化利用与商业价值的发掘开辟了新道路。^[8]

当前司法实践采用了间接的方式来回应公共数据权属的问题，即不直接对数据权属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是借助数据开放主体

和数据利用主体的划分，从职能上明确各方在数据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责。例如，《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市政府各部门、区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作为数据开放主体，分别负责各自系统、行政区域和单位的公共数据开放工作。

有学者认为，其实无论是公共数据还是个人数据实质上具备可流通性，关键在于法律对于数据控制者所赋予的合法使用权的认可。在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时，可基于实际控制情况协调数据的使用权，实现数据的社会化利用。^[9]在警务数据的规范化交易过程中，公安机关等数据控制者并未完全放弃对数据利益的管理权。当公安机关等主体计划利用其持有的警务数据进行商业交易或其他形式的利用时，必须采取一系列严格措施，如数据脱敏等，以确保数据使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三）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实现

警务数据交易作为警务信息公开的一种新型实践方式，其根本在于依托数据开放，利用数据交易这一手段，实现公安机关及相关授权主体在行政职能与管理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资产价值。^[10]这一过程旨在推动数据资源的流通与价值的创造，其核心在于发掘数据要素本身的价值。

与常见的消耗性物质商品不同，数据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性，这使其资源价值更为显著。通过持续的数据整合、汇集与深入分析，不仅能够保持数据价值的不减，反而可以降低二次采集的成本，持续创造新的价值，具有潜在的无尽可能性。

当前，公安系统内部构建的警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在治安管理、刑事侦查、行政审批等诸多领域均发挥出显著的数据效能。

这一机制不仅推动了警务工作的内部优化，更对社会的整体安全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实现警务信息资源的共享，不仅推动了相关产业尤其是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还促进了外部数据资源与内部数据的有机整合，大幅提升了警务决策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警务数据交易作为警务信息共享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公安机关提供了将数据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途径，为警务工作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是公安机关在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治理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

三、参赛：警务数据交易风险预判与障碍审视

相较于其他公共数据，警务数据在参与数据交易方面的进程无疑相对滞后。鉴于警务数据的特殊性，以及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警务数据的处理过程显得尤为复杂繁琐，不仅需要妥善平衡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关键要素与数据流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要面对诸如数据泄露、数据错误等潜在的法律风险。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公安机关在推动警务数据交易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清晰的路径。

（一）风险预判

在警务数据交易过程中，交易的客体并非原始数据本身，而是公安机关在合法获取原始数据后，通过算法进行深度分析、过滤提炼、整合脱敏等依法处理，从而生成具有商业价值和技术可行性的数据产品。

《数据新规》指出，“依法依规予以保密的公共数据不予开放，严格管控未依法依规公开的原始公共数据直接进入市场，保障公

共数据供给使用的公共利益。”与其他公共数据相比，警务数据涉及的敏感信息更多也更复杂，包括个人信息（如身份证明、行踪轨迹、生物识别等）和一些关涉公共安全的重要数据。从业务层面来看，警务数据可以分为户籍数据、交通数据、治安数据、消防数据、刑事数据、司法数据、铁路数据、警务技术数据、外事数据，以及监所数据等类型。^[11]警务数据大多以原始形态存在，未经脱敏、清洗和分析处理。^[12]对于警务数据而言，这种原始形态可能导致与实际应用场景的不匹配。因此，警务数据只有经过规范脱敏处理、分析加工后才可进行交易，否则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警务数据交易若不合规，其潜在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对于国家层面，一是国家安全风险，各类数据的交易，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如外事数据、警务技术数据等，一旦泄露或被滥用，可能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二是社会稳定风险，部分数据的交易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治安数据、刑事数据的泄露可能导致公众恐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个人层面，警务数据交易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个人隐私的泄露、名誉与信誉的受损，以及经济利益的损失。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这些风险都是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

与纯粹的数据法体系规制不同，警务数据安全还受到警察法体系的共同规制，然而，这种双重监管亦凸显了两者在规范效力和具体内容表述上的显著差异。数据法体系因其较高的效力层级，主要侧重于一般性原则与规则的设定，其内容较为抽象和宏观。相对而言，警察法体系则更加细致入微，但主要局限于公安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或

执法政策，其效力层级相对较低，难以形成广泛的共识。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在警务数据开放方面的举措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较大的随意性，这无疑对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障碍审视

警务数据交易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议题，尽管公安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警务数据交易与之在条件、程序上仍有很多不同。更为关键的是，警务数据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对其法理内涵、理论逻辑和功能价值的理解仍显得零散和不够深入，面临着警务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迫切需求与数据治理体系建设进展相对滞后的矛盾。^[13]

从制度层面审视，当前警务数据交易领域的法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科学且充分的制度支撑。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数据记录方式的问题，数据遗失现象时有发生。^[14]此外，由于“保密”规定的限制，许多数据难以合法流通。诚然，警务数据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公安工作，严格执行保密规定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存在滥用保密权力的现象，以“保密”为借口导致本应公开或提供的数据被拖延。这种情况不仅使警务数据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造成大量数据资源闲置或半闲置，^[15]而且阻碍了警务数据应用的现代化转型与升级，导致数据供需失衡。这既限制了警务数据的有效利用，也影响了公众对警务数据交易的信任度和参与度。以2018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发起的警务数据倡议为例，其目的正是为了提升警务部门的影响力。^[16]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和标准，警务数据交易在质量和水平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当前，警务数据开放平台所

涉及的数据问题已引起广大用户及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例如英国警务平台发布的地理编码数据，学者发现其在较大空间的数据呈现和区位层级的数据呈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空间越小，误差越显著。^[17]因此如何提升警务数据的准确性、减少误差，并优化数据的记录与呈现方式，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价格定制方面，《数据新规》明确提出，“探索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有偿使用。”合理的交易价格对于交易双方来说都有其必要性，是推动公安机关进行数据交易的内生动力之一。在警务数据交易中，必须充分考虑警务数据开发的成本投入。数据的采集、脱敏处理，以及数据参考模型与分析模型的构建，均需要显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为了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稳定性，这种投入还必须是大规模的且持续的。^[18]在国外，像《欧盟公共部门数据定价研究报告》（POPSIS）提出了包括利润最大化、成本回收、促进再利用成本回收以及边际成本在内的多种机制，以支持成员国采用数据授权运营模式，持续深化公共数据交易及其治理工作。^[19]

四、裁判：警务数据使用的语境重塑

警务数据的再利用是未来数据使用的新语境，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0—2026 年中国公安信息化行业前景研究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公安大数据行业市场规模大约为 350 亿元，且信息化市场规模正在不断增长。因此有必要重新塑造警务数据应用语境，确立合理的数据获取与使用界限，以促进警务数据的有序流通

与高效利用。

（一）有限交易和严格保护

警务数据特征与其工作属性紧密相连，安全利益无疑在警务数据保护的利益权衡中占据首要地位。因此，在构建警务数据交易制度体系时，应当确立以维护数据安全为核心的交易原则，严格贯彻合规交易理念。数据安全利益保护的判断依据不是绝对消除风险，而是将风险降低并控制在合理范围。^[20]《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的保护思路，公安机关在数据交易中，亦应根据数据的重要性、敏感性、涉密程度等因素，在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下，制定警务数据交易“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外部监管和内部自我监管相配合，形成保护墙。

传统上，警务数据主要服务于查询、检索与比对等应用场景。^[21]随着警务数据的广泛应用，在警务数据交易领域，有必要构建一个以动态保护为核心的规制路径，严格把控整个交易程序。在数据交易正式启动之前，首先要筛选和脱敏即将投入市场的警务数据。鉴于警务数据的特殊性，根据数据的风险等级，并结合警务数据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处理能力，审慎选择适用于交易的警务数据。根据数据的敏感度和涉密程度，可以将警务数据划分为轻度敏感涉密，中度敏感涉密和重度敏感涉密三个等级，并为每个等级设计相应的交易处理方式。^[22]

关于警务数据脱敏，我国可以借鉴英国国家警务数据开放平台的成功范例。除直接隐藏重要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外，还需针对各类信息制定更为精细的脱敏处理规则。这包括构建一套专门的数据匿名化处理工作指南，例如仅展示月份而非具体日期、替换犯罪编号和类型、依据统一标准转换犯罪

发生地的经纬度、建立专有的地点匿名处理机制等，从而实现数据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均衡。^[23]

同时，数据的交易和使用过程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包括对数据需求方的资质和信誉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他们具备合法、合规的数据使用目的和能力。其次，在数据交易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这包括使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和安全审计等手段，防止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篡改或滥用。此外，应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机制，确保数据的访问、使用和共享都受到严格控制和监督，并且配备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数据泄露事件。

在警务数据的交易实践中，由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其进展往往滞后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推进速度。为确保警务数据交易的稳步进行，建议在初期阶段，优先选择脱敏后的轻度敏感涉密数据作为试点。通过逐步推进、细致观察与及时调整，探索出既保障数据价值，又适应警务数据交易需求的合理模式，从而平衡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的关系，推动警务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二）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

在政务信息公开的情境下，政府数据对数据需求方是无偿提供的，这意味着政府数据开放服务是免费的公共服务。相应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也作为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存在，公众如果有所诉求则可以通过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途径进行表达。显然，警务数据交易属于有偿的公共数据开放，此时应认定公安机关与数据需求方也即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协议，即将非市场性行为作为判别行政协议的主

要因素。^[24]因为这种交易并非公安机关为了行使行政职权所采取的举措，而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平等原则下签订的民事合同。

然而，基于警务数据的特殊属性，应当设立一套在民事合同之外的数据安全保障条款，让公安机关对于警务数据的控制权受到优先保护，确保必要时收回等权利，^[25]以遵循警务数据的安全利益保护优先原则。基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此可给予数据需求方以相应补偿。另外，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违法违规、违反合同约定使用警务数据的行为，公安机关将有权终止相关合同，并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

（三）顶层设计完善与第三方平台监管

警务数据，作为公共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核心利益。因此，监管机构在公共数据交易过程中，必须对信息流、资金流、使用场景以及交易价格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精细化的合规性监管。公安机关作为数据交易的参与者，因其多重身份地位，可能面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冲突风险，进而影响交易的公平性。

鉴于此，选择具备中立性和公共属性的数据交易平台作为交易场所显得尤为重要。数据交易平台能够充分发挥第三方在规则制定和执行方面的专业优势，比如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与发改委、数据局等部门紧密合作，共同研究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务数据价格形成机制，确保价格监测和披露的有效性。当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出现失真等问题，影响正常使用时，数据交易平台能够迅速介入，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实现有效问责。此外，数据交易平台还能协助网信办等监管机构对警务数据交易进行全流程监管，公正评估交易场景的合规性。通过依托第三

方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监管的质量和效率，加快推动警务数据的合规、高效流通和使用，可以切实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另外，数据交易平台的行为责任不容忽视。《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对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作出明确规范。鉴于数据交易平台承载着重要数据资源，其工作人员可能面临与交易双方勾结或提供不当便利的风险，同时亦可能出现垄断、不正当竞争等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针对警务数据交易的数据交易平台责任问题，有必要增设相关细则，以明确禁止行为和特定义务，清晰界定权责，^[26] 确保数据交易平台行为的合规性，最终保障数据交易工作的圆满完成。

注释：

- [1]Bhimani, A. Exploring big data's strategic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 1
- [2]范佳佳. 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模式研究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4. 2
- [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EB/OL]. 2015. 9. 5
- [4]江小涓.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管理与服务：提升能力及应对挑战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9
- [5]高文英. 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 [J]. 警学研究. 2019. 1
- [6]申卫星. 论数据用益权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11
- [7]龙卫球. 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 [J]. 政法论坛. 2017. 4
- [8]李海敏. 我国政府数据的法律属性与开放之道 [J]. 行政法学研究. 2020. 6
- [9]高富平. 数据流通理论 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 [J]. 中外法学. 2019. 6
- [10]张毅菁. 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的全球实践——兼对上海建设“政府数据服务网”的启示 [J]. 情报杂志. 2014. 10

- [11]王娜. 如何解码警务数据治理“黑箱”——基于“资源支撑—路径安排—价值创造”的分析 [J]. 公安学研究. 2022. 5
- [12]Lihua Huang, Yifan Dou, Yezheng Liu, Jinzhao Wang, Gang Chen, Xiaoyang Zhang, Runyin Wang. Toward a research framework to conceptualize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data marketplace perspective. *Fundamental Research*. 2021. 1
- [13]秦国春.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之刍议——《数据二十条》为公共数据要素化迎来新契机 [J]. 中国经贸导刊. 2023. 3
- [14]Quinn A, Cooke L, Monaghan M.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gress of Open Crime Data:How Do Ongoing Limitations with the Police.Uk Website Restric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ecorded Crime?. *Policing and Society*. 2019. 4
- [15]张宁. 我国公安数据开放的政策过程、现状评估与拓展路径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2. 2
- [16]Megan Smith,Roy L, Austin Jr. Launching the Police Data Initiative[EB/OL]. 2015. 5. 18.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5/05/18/launching-police-data-initiative>
- [17]Tompson L, Johnson S, Ashby M, et al. UK Open Source Crime Data:Accuracy and Possibilities for Research.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015. 2
- [18]方凯. 论政府数据开放情境下数据交易行为的法律性质 [J]. 中国法律评论. 2022. 6
- [19]吴亮.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治理的法律完善 [J]. 法学论坛. 2023. 1
- [20]许可. 数据安全法：定位、立场与制度构造 [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 3
- [21]叶涛. 论警务数据安全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
- [22]戴文怡. 司法数据的再利用及其规则配置 [J]. 中州大学学报. 2021. 1
- [23]陈恺迪. 国外警务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现状及启示——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17个平台为例 [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2. 5
- [24]同 [18]
- [25]王嘉贤. 论信息时代的警务数据开放制度 [J]. 公安学研究. 2021. 2
- [26]何卿豪. 数据交易监管理念及制度体系构建 [J]. 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 2023. 5

责任编辑 马煜童